

云南民族村寨调查

跨世纪的思考

——民族调查专题研究

云南大学组织编写
主编 高发元



云南民族村寨调查

跨世纪的思考

——民族调查专题研究

分册主编 张跃

分册副主编 戴顺祥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民族村寨调查/高发元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4

ISBN 7-81068-240-7

I. 云... II. 高... III. 少数民族-居住区-调查报告-云南省 IV. 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043 号

云南民族村寨调查

跨世纪的思考——民族调查专题研究

主 编 高发元

分册主编 张 跃 分册副主编 戴顺祥

责任编辑 周永坤

封面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制 云南省地矿局印刷厂印制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50 千

印 张 18

印 数 0001-2000

版/印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8-240-7/C·24

定 价 513.00 元 (全书共 27 册, 每册 19.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社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1071 传真: 0871-5162823

邮编: 650091 E-mail: yupress@sina.com

云南民族村寨调查

编委会

主 编 高发元
副主编 吴 松 朱维华 林超民
 洪品杰 武建国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禹功	朱维华	肖 芒(执行)
吴 松	李 杰(执行)	何 明(执行)
张 跃(执行)	张昌山(执行)	张晓辉
张鑫昌	武建国	林超民
姜子华	胡兴仕	洪品杰
施南华	施惟达(执行)	顾士敏(执行)
高发元	戴顺祥(执行)	

·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

总 序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省区组织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收集到上千万字的文字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它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收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的时刻，党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围绕这一战略，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宏伟目标。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

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在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F·普洛格、D·G·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做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的这次民族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

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一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院系，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人员参与，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142 人，其中教师 37 人（教授 11 人，副教授 20 人，讲师 4 人，助教 2 人），学生 105 人（博士生 4 人，硕士生 72 人，本科生 25 人，专科生 4 人）。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第一，完成了一批规模浩大的文字成果。这次调查，完成了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 25 本，文字总量 500 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民族人口、民族经济、民族社会、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婚姻家庭、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民族科技、民族卫生、民族宗教 12 个专题研究报告和 1 份综合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 28 万字；1 份调查工作实录 28 万字；云南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调查报告 1 份，5 万字。

第二，形成了一批音像资料。25 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 4 000 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第三，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血样。在进行经济社会调查的同

时，还采集云南少数民族 1 200 多人的血样，形成了初步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基因库。

第四，锻炼了队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扩大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第五，积累了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第 166 页）。这次调查，积累了经验，也得到一些教训，这是一笔无形而珍贵的财富。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先把 25 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总的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这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目 录

民族学田野调查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综合报告 何 明 (1)

云南少数民族村社政治分析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政治专题研究报告
..... 周 平 (19)

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渐变的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经济专题研究报告
..... 林文勋 张锦鹏 杨华星 (47)

半个世纪以来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变迁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社会专题研究报告
..... 马 京 荣 莉 (88)

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与变迁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人口专题研究报告
..... 吕昭河 (111)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与作用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法律专题研究报告
..... 张晓辉 王启梁 (159)

嬗变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婚姻与家庭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婚姻家庭专题研究报告
..... 肖 芒 (198)

云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现状与思考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宗教专题研究报告
..... 郑维川 (243)

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文化专题研究报告
..... 施惟达 (274)

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云南少数民族教育

-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教育专题研究报告
..... 张昌山 谷跃娟 范永春 (302)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现状分析与思考

-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科技专题研究报告
..... 赵 美 陈 波 (327)

跨世纪的云南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

-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医疗卫生专题研究报告
..... 张 实 (375)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发展的生态关联

-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民族生态专题研究报告
..... 杨桂华 (401)

自然科学在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

- 云南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调查报告..... 肖春杰 (433)

附录一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大纲

- 张 跃等 (441)

附录二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问卷表

- 张 跃 汤芝兰 (513)

附录三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统计表

- 汤芝兰 张 跃 (539)

编 后 语 张 跃 (561)

民族学田野调查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 综合报告

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 何 明

在人类社会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刻，云南大学组织了一支 140 余人的调查队伍，组成 25 个民族调查组和 1 个遗传信息调查组，对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云南 25 个少数民族进行了田野调查。调查组采用现代人类学通行的小型社区调查的方法，即从每个民族聚居区中各选择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村寨进行重点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民族生态、民族人口、民族经济、民族社会、民族政治、民族习惯法、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民族科技、民族宗教、遗传信息等 11 个方面。

现对此次调查的过程、方法和成果进行介绍，并根据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做一总体描述与分析。

一、调查选题：处于世纪之交的云南 少数民族现状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 50 年代，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组织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云南少数民族是其主要调

查对象之一)，基本摸清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掌握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为民族识别、在民族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制定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

时光荏苒，匆匆之中，人类又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这近 50 年的时间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变迁。其间，尽管一些民族工作部门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研，民族学研究者们也曾做了一些单一民族的调查或专题调查，但系统、全面的综合调查一直付之阙如，形成了云南少数民族现状“家底不清”的问题。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云南少数民族的现状如何？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民族文化资源的情况怎样？各民族群众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面临着一些什么困难和问题？党和国家一系列关于繁荣民族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维护民族团结的政策在云南各民族中执行的效果怎样？这是制定云南少数民族的跨世纪发展规划和适应新形势的民族政策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进行民族研究、推动民族学研究的深化，也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通过对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决定将此次调查的选题确定为“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就是通过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云南少数民族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反映半个世纪以来云南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为科学决策和学术研究提供具体、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二、调查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与 促进学术发展

此次调查既有明确的为社会服务的现实目的，又有明确的学

科建设的学术目的，是一次兼具现实目的和学术目的调查。

目的之一：为实施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云南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战略服务。

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调查的重要意义还远远超出它的学术性。”^①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为学术界树立了楷模。他60多年致力于社会调查，足迹踏遍祖国的东西南北，因为他坚持的是“志在富民，皓首不移”的治学思想。在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费老感慨地说：“随手我可以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②他认为，是否够格称学术，“还得看它是否抵用，能不能富民为断”^③。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就组织有关专家开展了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并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思路。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民族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云南省委、省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云南跨世纪发展战略。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云南是西部多民族省份。中央和云南省的这一发展战略，为民族学研究尤其是云南的民族调查研究提供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最佳结合点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云南大学将此次民族调查作为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①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②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③ 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载《费孝通学术近著》。

展服务的一项重大举措。根据西部大开发、建设绿色经济强省和民族文化大省等战略的基本要求，组织调查工作，将相关内容贯穿到调查的各个环节之中。如，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此，在拟定调查大纲、设计调查问卷、编写调查资料以及专题研究中，我们有目的地把以往的民族调查中很少涉及的生态环境和人口问题作为重要部分和专题加以突出。再如，加快西部地区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高西部地区的人口素质和科技水平，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在田野调查与专题研究中，我们同样以之为重要部分和专题加以突出。我们力图通过田野调查与专题研究，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与揭示云南少数民族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变化的现状、规律、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战略措施以及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

目的之二：获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与开展大规模田野调查的经验和云南各民族最新的发展变化状况，推动民族学学科的建设。

中国的民族学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历程。其中，有举世瞩目的重要成就，也有令人惋惜的惨痛教训。通过开展民族调查获得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民族调查的实践来总结经验、纠正偏差，是民族学在 21 世纪获得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学术规范化和学科本土化，是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一批在国外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老一代民族学家，通过推介国外研究成果、探讨调查研究方法、深入开展田野调查，使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初步建立起了本土化的学术规范。50 年代以后，受前苏联学术体系的影响，

民族学被从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纳入到历史学科之中，成为历史学方法的一种补充，失去了其应有的学科独立性和学科规范。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民族学开始恢复与重建，再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一门学科的学术规范，不可能简单地随着其学科的独立而在短时期内形成。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学学科，其学术规范特别是本土化的学科规范，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实践来确立，即通过田野调查实践的“证伪”或“试错”，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

通过吸收与借鉴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进行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是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民族学学科规范化和本土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三大科学发现”（即细胞学、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民族学（人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泰勒、摩尔根等人借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理论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只有充分吸收与借鉴科学技术的最新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如基因技术、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等，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而作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学，只能通过田野调查的实践即实际应用，才能寻找到吸收与借鉴科学技术新理论、新方法的途径，也才能检验其有效性。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历来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资源宝库。作为云南省惟一的综合性大学，云南大学是中国民族学人才培养与学科研究的重要基地，在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堃等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他们的名字和成就都与云南相连，都与云南大学相连。因此，在

“211 工程”建设中，民族学被列为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惟一的重点学科加以建设。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出现了“重史料，轻田野”的偏差，呈现出民族学各分支学科“畸轻畸重”的不协调格局，民族调查这一民族学学科的主干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特有的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未能显现出来，从而制约了云南大学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发挥。这里要特别申明的是，我们如是说，并无否定民族史在民族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云南大学民族史研究的含义，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先辈学者的斐然成就始终为我们所尊崇。我们的本意是：在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中，民族史是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

为此，云南大学在组织“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的过程中，着重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牢固树立田野调查在民族学学科建设中的主干和核心地位；第二，通过田野工作的实践，培养与锻炼民族学人才；第三，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中确定民族学的学术规范，促进民族学学科的本土化；第四，在调查内容和方法上，大胆引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如基因技术、生态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等，努力推进民族学学科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通过上述努力，努力推动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和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促进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三、分析单位：少数民族农村社区

确定调查对象和分析单位是田野调查工作正式开展之前首先必须做的工作。此次调查将调查对象确定为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云南少数民族，而把分析单位确定为少数民族农村小型社区，即每一个少数民族选择一个村寨或行政村、乡镇作为典型，进行

深入、全面的社区调查 (community survey)。

社区调查始于英国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西太平洋的特洛布里安德岛 (Trobriand) 的调查。这一调查被认为是人类学的方法论从宏观的历史中分化出来进入实地研究与社会理论化时代的标志,也是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的标志。为了避免此前人类学“或在进化的阶段问题上绕圈子,或在这种或那种文化现象如何传播问题上索求来龙去脉……而对于界定和联想文化因素在文化事实中的运作没有赋以充分的重视”的弊端,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把众多的文化事相置于“文化事实”(culture facts)或所谓“分立群域”(isolates)的整体中考察,即田野工作的社会空间单位,以展示其互动关系。^①这一方法成为人类学调查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的带动下,中国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对“社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吴先生认为,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②不仅如此,吴先生还创立了以“社区方法论”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学派”,力图通过研究中国乡村的村落社区,展示中国社会的一般特征,并对文化变迁作出研究结论。^③于是,燕京大学的一批青年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区调查,广泛深入中国农村社会,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 年)和《禄村农田》(1944 年),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3 年),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6 年),林耀华的

① 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27~28 页。

② 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第 5~7 页。

③ 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30~31 页。